

论拉斯韦尔的精英理论

左高山

(清华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哈罗德·D·拉斯韦尔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者和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把精英分析扩展到了政治舞台之外的广大领域, 并对精英的统治方式进行了深入而独特的研究, 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拉斯韦尔; 精英理论; 象征; 暴力

中图分类号: C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5-0559-05

—

哈罗德·D·拉斯韦尔与早期的著名精英论者如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等对精英主义的开创性探索, 使精英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主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拉斯韦尔所倡导的行为主义精英分析法在美国政治学界广为流行, 他摒弃从抽象概念出发研究政治制度、以历史比较为研究方法的早期政治学传统, 拒斥政治学中道德取向和政治价值等问题的研究, 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引入政治学研究中, 从而把政治现实中可以观察的行为作为其研究重点。拉斯韦尔也因其开创性贡献而成为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者和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精英统治理论以及关于宣传的“五 W”模式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精英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异质性, 即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 总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 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1](97)}。帕累托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精英”由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组成的观点。在帕累托看来, 精英概念兼具“高度”与“素质”两方面的成分。所谓“高度”是指某种可以客观判断的成功标志, 如职位、得分、盈利等, 而“素质”则指个人的才智或涵养。他关注的是相对于非精英或较低社会阶层而言的所谓“统治精英”或“政治精英”^{[2](149)}。拉斯韦尔则排除了帕累托精英概念中的素质成分, 仅用“高度”指标作为精英的衡量标准。他指出, “精英是用于分类的、描述的概念。

它指的是某一社会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人。有多少种价值就有多少种精英。除了权力(政治精英)外, 还有财富、名望和知识等方面的精英”^{[3](149)}。他认为, 政治研究就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取得价值最多的是精英; 其余的人是群众”^{[4](3)}。与传统的精英理论不同, 拉斯韦尔反对把精英的来源局限于社会的少数阶级, 主张精英应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进行广泛的挑选, 他说: “民主政治的领袖是从社会广泛基础中选拔出来的, 并且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积极支持”^[5]。这样, 拉斯韦尔就把精英分析扩展到了政治舞台之外的广大领域, 这也是他对精英理论的一大贡献。与其他精英论者一样, 拉斯韦尔也承认精英与大众之别是普遍的事实。但他批评莫斯卡和帕累托视民主政治为不可能的观点, 强调精英与民主政治可以同时存在, 他说“在一个由少数人担任领导者的社会, 仍可能是民主的”^[5], 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对精英的有效控制。拉斯韦尔认为, 为了达到对精英的有效控制, 就必须建立精英对大众的“责任制度”, 而民主政治就是被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分享有最少量的权力, 但这种权力须足以控制统治者, 使之能负责任。这里, 拉斯韦尔虽承认权力的分配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平等的, 但只要这个社会其统治者向被统治者负责, 而被统治者具有影响统治者的权力, 同时社会提供全体公民平等地获取权力的机会, 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社会。他对精英理论的深刻论证使他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精英论者。

拉斯韦尔认为,价值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不同,对精英分析的结果也不一样。例如,按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分析方法对权势人物进行分析,其结果都是不同的。因此,拉斯韦尔像莫斯卡、帕累托一样都标榜其精英理论是基于科学的观察和分析。特别是,拉斯韦尔主张政治学的任务仅限于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4](3)}。并认为陈述事实和价值判断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道德准则或规范性传统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在他的论述中,经常可以看到价值判断与事实陈述的混杂。他并不无视道德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的现实意义。而且“精英-大众”两分法本身就有规范含义的嫌疑。可以看出,精英一词在拉斯韦尔这里成了一个纯粹的分析性概念,一个不再含有价值意蕴的中性词。这样,就使得判别精英的标准经验化与客观化,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于是,精英概念便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普遍范畴。诚如萨托利所言,“我相信,拉斯韦尔在一点上是无人可比的,他确立了‘精英’作为一个普遍范畴,用来讨论我们效法他而称呼的‘统治精英模式’”^{[2](150)}。然而,由于他抛弃了素质标准,将占据高位的人等同于精英,往往会导致新的问题,即“精英赝品”的出现。“如果纯粹根据权力和高度来定义精英和具体的政治精英……就会阻止我们看清楚精英的素质(和标准)与权势地位(被不恰当地等同于精英地位)之间的差别。结果精英研究输掉了最关键的牌局——不是权势人物存在的问题,也不只是权力精英是一群还是数群的问题,而是权势人物是真正的精英还是赝品的问题。”^{[2](180)}

拉斯韦尔从精英和大众的互动关系中描述、解释和说明政治现象,为我们观察政治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权势人物身上并不意味着对整个社会中各种价值的全面分配忽视不管。不考虑多数人,就不可能确定少数人。着重研究少数人取得多数东西的可能性并不表示多数人从政治变化中得不到好处。”^{[4](15)}他的这种认识不同于传统的精英理论家的观点。在拉斯韦尔的著作中不难发现,其精英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他也认为统治阶级(精英)的现实基础是其社会经济地位。在他的论述中,多次提到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是现代最重要的政治分析法^{[4](137)}。而且从他对意识形态和暴力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

的学说,这是他不同于其他精英论者之处。因此,许多西方政治学家据此认为,拉斯韦尔等的政治精英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例如,米歇尔·温斯坦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政治精英理论家提供了两个核心思想。第一,政治精英理论家采纳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每个社会的特征取决于一个力图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的使用价值的统治阶级。第二,他们发展了这样一种概念,即在敌对社会的团体的斗争中,政治思想是武器。……政治精英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定型了。”^{[6](173~174)}事实上,他们的精英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

对精英统治方式深入而独特的研究是拉斯韦尔对当代精英理论的最大贡献。他认为,精英通过对象征、暴力、物资与实际措施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来达到特定目标。

首先,对象征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研究在拉斯韦尔的精英统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著名的“5W”宣传模式更是影响深远。他认为,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4](19)}。所谓“共同命运的象征”即现行“意识形态”,精英利用意识形态在群众中形成共同的话语和态度,赢得统治合法性,从而达到遏制反对、得到拥护,巩固统治地位和获取特殊利益之目的。他说:“在政治制度运转正常的情况下,群众对这些象征推崇备至;向来伪善而大胆的精英才不会因为感到不道德而产生痛苦。”^{[4](19)}这些分析,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

他强调意识形态必须进行灌输,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必须从人的襁褓时期开始,直到他埋葬如土之日为止,反复地进行灌输。”^{[4](19)}早在1932年他就提出了一个简明而又清晰的宣传模式:“谁?说什么?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这实际上与当时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对外扩张加快,迫切需要对内对外进行政治宣传紧密相关。他认为,宣传就是一个劝服的过程。1948年,在一篇题为《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的文章中,对他早先提出的模式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即“通过什么渠道”。这样,著名的“5W”模式就形成了,即包括: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by what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篇论文一问世,便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认为是一部纲领性的力作,一部传播学的独立宣言,甚至还有人认为,所有的传播学研究也“仿佛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一文的注释,因为它涉及传播学中的许多基本内容”^[7]。

他认为,精英们宣传时采用的方法常常是重复或分散注意力。这是公众不断变化的感情需求之使然。卓有成效的宣传在处理攻击、内疚、虚弱和喜爱等情绪方面是灵活多变的。例如,当一个国家作为一种威胁出现时,对它加以破坏的报复性冲动情绪会迅速被激发,但并不会立即直接表现出来。他们一部分被隐藏,一部分会受到抑制,但是它们对精神生活的趋势和基调是会产生影响的。在对付内心压力的方法中,最简单的就是投射法。这种方法通过将自身情感看作是一种环境的属性来解决内心情感上的各种困难。一个人不但看不清自己报复性破坏情绪的强烈性,反而会感到外部世界的破坏性比实际情况远为强大。这样,把破坏性推到别人头上,也就使这种杀气腾腾的感情冲动从道德上得到了解释^{[4](25~26)}。他的理论分析,在“9·11”恐怖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印证,这也说明了实证方法研究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的某种科学性与客观性。

拉斯韦尔对现代国家的“危机”问题同样作了令人信服的研究。随着危机的发展,“国家”不断地被推到注意力的中心点上。人们平时关注的事务因为受有关国际冲突的种种消息和谣传的影响而变得微不足道了。他说:“由于周围有许多‘他们’的象征,人们的眼光全都集中到代表国家的‘我们’这个象征的命运上。对某些外国人象征原先抱有的爱和尊重受到削弱,成了集体的‘我们’的象征的各种附属品。受到威胁的感觉大大增加了爱的需要,于是,国家变成了一个具有无限保护作用 and 无限宽容的、强大而睿智的象征。”^{[4](26)}

拉斯韦尔认为,对中立国家的战争宣传是要引导其权势人物把我们的敌人看作是他们的敌人,把我们的事业看作是他们的事业。这可以通过积极提供各种有利机会,使旁观者变为参加者的办法来完成。而对盟国宣传时,则要突出我们在战争中所作的艰苦努力,和我们对结盟国家抱有的战争目标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对敌对国家进行宣传的主要目标则是设法把敌对情绪转向其他敌人,或者使这种敌意转向内部,以便酿成内战或引起革命^{[4](27)}。美国在战争中恰恰是这样实施的。例如,最近的伊拉克

战争中美国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达到了意想不到的目的。

他认为,革命的目标也在于取得对敌人的强制性优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革命宣传所选择的象征,就是那些预计可以使群众的感情背离现存权力象征,可以把群众的喜爱之情转移到挑战性象征上去,而且可以把群众的敌对情绪引向现存权力象征的那些象征。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在战争中,社会的破坏性能量是沿着人们所熟悉的渠道排泄的。而从事革命活动的大多数人都要面临一个道德观念危机的问题。因为合法当局是靠塑造那些出生在他们控制范围内的人们的道德观念来维持和延续他们的统治的。因此,他认为,“革命就是同道德观念的决裂”^{[4](29)}。例如,马克思主义用谴责“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来鼓励攻击情绪的投射。马克思主义用控制资本主义是战争、贫穷、苦难、疾病之源来鼓励内疚情绪的投射^{[4](30)}。某些带偏见的革命运动是由那些与最新世界革命运动有联系的分子的精英领导的。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都是好战的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不管他们在象征上或实际上从最新世界革命模式方面借鉴了多少东西,他们总是掩盖自己的盗窃行为,憎恨自己的根源^{[4](30)}。

其次,暴力方法论是拉斯韦尔精英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暴力是精英统治的重要手段。他从暴力与政治的关系角度,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对暴力行为进行了详细透彻的“行为主义”研究,说明了暴力在政治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暴力使用的策略、具体措施及其他行为的综合协调等等。

他认为,“把暴力作为一种权势工具而加以合理使用有赖于把暴力行为作为全局中一个方面来看待而对它作出清醒的估价。把它作为一种全面毁灭工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它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但是,事实上暴力的合理使用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防范以肆意进行破坏为乐,许多研究暴力问题的古典评论家都特别强调暴力所起的工具作用和它的特殊危险。”^{[4](33~34)}只有当暴力行动作为全局行动中的一部分被正确有限地使用时,它才能成为精英权势工具的有效组成部分。他始终认为,“暴力只是正在发展着的形势下为达到某些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方法”^{[4](45)}。这就正确地认识到了暴力只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其目的。拉斯韦尔认为,战争很少是“绝对的战争”;它只是由忠诚、希望和期待等各种相关因素

组成的变化不定的整体中的一个侧面而已^{[4](35)}。

有效使用暴力还包含在整个行动中把破坏力量的优势集中到某些要害部位上的问题。所以,拉斯韦尔特别强调“经济”、“合作”、“运动”、“出奇”与“集中”等作为完成总的目的的手段^{[4](37)}。暴力行动的成功取决于组织、宣传、新闻情报之间的相互配合。当事先预料到暴力行动对人们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与行动本身的直接客观后果不相称时,暴力行动就变成了“用事实作宣传”。例如,刺杀。“用事实做宣传”的合适目标是那些干掉此人会使敌人陷于惶恐万状,并会削弱拥护现行制度的人们之统一意志的人物。有时,刺杀的目的在于表示抵抗是可能的,或是在于打破敌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或是为了煽起群众动乱^{[4](40~41)}。很明显,使用刺杀手段以排除对自己有危险的人物,不论对现行制度的攻击者或是保卫者来说,都是可取的。但是,在这些情况中往往包含着宣传以外的其他考虑。与刺杀的情况相同,在恐怖行动中,宣传目标也居于首位。

拉斯韦尔认为,暴力行动中情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革命暴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情报掌握的准确度和时效性。而情报的获取又决定于情报人员,因此,情报人员首先要忠诚于精英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或神话;其次要有超人的技能^{[4](42~44)}。

拉斯韦尔对暴力行动中人员死亡的善后工作也作了意义的探讨。他认为,要努力提高心理报酬而不是物质报酬。因为付给金钱报酬对于死者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强调“荣誉”、强调颁发嘉奖状和勋章等带有神秘力量的做法就具有象征的意义。这样既可以减少维持一定工作量的费用,又能避免把太多的思想花费在计算冒险与效益之间的比例上^{[4](44)}。

拉斯韦尔强调了对暴力等政治行为的研究,而忽视其政治价值的分析,难免失之偏颇,因此也很难全面揭示政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现代战争中,暴力仍然是政治的一种延续。由于其高科技化、系统化和协调化的综合运用,较之传统暴力更加有效。暴力的存在和使用仍然为政治的需要所左右。只有将暴力放在国家政治体制下,放在政治权力的运行中考察,才能全面客观地把握暴力的本质。

第三,宣传和暴力都离不开物资。精英运用物资进行统治时,常用的形式有毁坏、扣留和摊派。此外,还有阴谋破坏或停工;罢工、抵制、黑名单、不合作;配给、定价、贿赂^{[4](47)}。现代社会中,精英的安全与物资和价格的波动紧密相联。倘若一个精英不能

使其与经济繁荣联系起来,他就会受到内部的攻击。精英从配给制和价格制的结合中寻求其安全。在资源使用中采取配给制效率是很高的。特别在紧急状态下,统治精英更习惯于依靠配给制来控制人民的行动和态度。但是,这也可能使不满情绪集中到统治精英头上。当配给制严重滞后时,就可能损害合法当局的威信。如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府的表现就是例证。规定价格和配给一样,都可以有效地剥夺个人的取舍自由。当劳动和商品的价格由统治精英所确定时,责任也将由其承担^{[4](48~49)}。此外,还可征收直接税或间接税以及捐款或认购债券等方法限制个人。当然,价格制的蒙蔽作用减少了精英成为众矢之的的可能性。

物资的控制对任何革命都是至关重要的。拉斯韦尔认为,反对派精英必须更多地依靠宣传,而不是物资或暴力。因为统治精英掌握着物资的支配权。而群众的潜在经济实力或战斗实力可以通过耐心和持久的宣传集中起来。在消费、生产及其他集体活动中拒绝合作向来是被剥削者的一个主要武器,能引起社会对其处境的关注,唤起对其有利的行动。就与敌对的外国精英集团的关系而言,一个精英集团的对外地位受其对物资控制情况的严重影响。物资既是战斗潜力的量度,又是战斗效率的工具^{[4](48~49)}。运用物资引起敌国人民的不满,争取同盟者、维护中立者和加强国内的士气,从而保证战争成功。例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布什总统通过国会追加800亿美元的军费来“安抚”与战争相关海湾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精英之间对物资控制权的竞争,在平时与战时几乎同样重要。一个特定社会的精英们,在来自内外的双重威胁下,只好对基本物资和服务先集中,再分散控制;先配给,再定价的摇摆政策,来达到劝诱、胁迫或转移目标的目的^{[4](61)}。

最后,拉斯韦尔认为,任何精英的优势地位都部分地取决于他所采用的实际措施的成功。这些措施包括所有吸收和训练精英的方法和所有在制定政策和实行管理中所采取的形式。他认为,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对社会的灾难要表示关心和照顾,对幸存者要表示及时而强烈的同情。不管是地震、涝灾、飓风、旱灾或是瘟疫,其所造成的不安全感都会对社会秩序带来严重的潜在危险。慰问加面包的效力远远比超过光给面包的效力。节省面包比节省慰问更为安全。他的这种理论已经被现代的政治家们运用得炉火纯青了。拉斯韦尔非常重视精英的可接受性

研究。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还在于其在大众中的接受与认可程度。精英地位的维持在于正确处理效率和可接受性的关系。为了效率而牺牲可接受性是危险的;而容许对可接受性的暂时考虑去掩盖某些低效率方式的长远危害也是危险的。

三

拉斯韦尔认为,使用单一的标准不能对权势人物作出令人满意的描述。权势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对诸如尊重、收入、安全等价值的要求上。但是,尊重不见得都属于有钱人,安全也不一定都归于杰出的人物。政治学的研究不能作出一劳永逸的成就和令人满意的肯定性结论,但它能为人们对社会不安全的多变轮廓不断进行的再估价提供某种方向性的尺度。拉斯韦尔并不完全排斥思考研究法的运用,其精英理论也根据技能、阶级、人格、态度来阐释事件的意义,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精英理论家之处。

毋庸置疑,拉斯韦尔的精英理论,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和方法论重新设定问题上,其所倡导的行为主义运动是成功的。例如,他认为,“政治学家们更多地倾心于近期的过去和最近期的将来,而不是遥远的过去”^{[4] (14)}。这种理论定位,使政治学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这种视野的变化可能要在政治学家的技巧和观念上引起变化。然而,拉斯韦尔的理

论也可能导致一些问题。首先,存在经验主义的危险,行为主义者可能陷于搜集大量数据资料,而无法把握明确的理论重心。因为政治生活毕竟是人的生活,政治行为也是人的行为。对政治生活的任何分析都无法离开人的主观体验,而主观体验是很难用数据进行量化的。人的政治行为也并非是按某种数学公式来进行的。仅仅借助于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够把所有的政治现象都分析得十分透彻是很不现实的。其次,它可能导致过分地强调方法,特别是计量的方法来处理有关政治行为的经验性资料。它可能堕入科学主义或确信政治生活受一系列自然法则控制的怪圈。最后,忽视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研究可能导致把有关正义的关键性问题简单地归入某些科学的推理范围。

参考文献:

- [1] [意] 加塔诺·莫斯卡. 统治阶级[M]. 南京: 江苏译林出版社, 2002.
- [2] 乔·萨托利. 民主新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 [3] 帕累托. 精英的兴衰[M]. 台湾: 桂冠图书公司, 1993.
- [4] [美] 哈罗德·D·拉斯韦尔.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5] 金贻顺. 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J]. 政治学研究, 1999, (2): 68.
- [6] 俞可平. 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7] 乐利文. 从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分析当代美国的国际宣传体制[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1): 56-57.

Who Gets What, When, How--On Lasswell's Elites Theory

ZUO Gao-shan

(Philosophy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Harold D. Lasswell is the precursor of the behaviorism school and elites theory. His contribution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lites extending to the wide realm besides of political stage, and he has researched the rule modes of elites, which impacts on the west society deeply and widely.

Key words: lasswell; elites theory; symbol/ violence

[编辑: 颜关明]